

老南街的记忆

□潘玉陶

生于老城南街,也长于南街。今天的南街高楼林立,白天车水马龙,人流如川;夜间华灯熠熠,五彩缤纷。充分显现出现代都市的气派。然而,如今我在梦中见到的南街,几乎都是旧时的模样。遇见的也是当年的人和事。因此梦醒之后总会勾起几十年前的许多记忆。这正应了一句名言:青春少年总是憧憬未来,暮年之人却爱回忆往事。

与其他三条大街相比,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的南街是最不热闹的。因此,编纂于30年代的《续修安顺府志》“民谚”第一条就是:东街一枝花,北街赛过它。西街平平过,南街苦养肥。之所以有此说法,是因为若干年来,销售时尚的高档消费品以及洋纱洋布绸缎的店铺,大都设在东街以及北街上半部,这些街道成为零售商业的黄金地段。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60年代,尽管属南大街辖内的今图书路曾有一个县衙门,县府路又设过知府衙门。因此可以说,一条街乃至一个城市繁华与否,商业起着决定作用。

我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的南街城门,当时已无城墙,也无大门,仅是一门洞而已。无论大小的一场雨之后,那城门洞顶要滴滴嗒嗒地漏水多日。由于没有了城门,自然也没有晨开夜闭的规矩,人们可昼夜进进出出。到后来,因为要通汽车,城门洞拆了。

街市上,临大街的小铺子多于大店堂,除了一家京果酱园,卖的多是些香蜡纸火、日杂用品。让人记忆深刻的铺面是一家纸扎店,师傅姓柳,他常年累月扎着各种工艺品,灯笼、风筝、花圈、冥屋以及办丧事用的纸人纸马纸羊。纸人有到阴间的伏头、有金童玉女、丫环帮工等等。因此,城中流行了一句俏皮话,说太瘦的人是“柳家扎的纸伏头”。那纸羊是用来替代活羊与活猪一并礼送丧家作“猪羊祭”。

这纸扎店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最有吸引力,我们常常在店门前一站就是个把钟头。如今我还记得店里扎的一丛荷花,枝叶花朵皆十分逼真,故如今每逢到一些荷花池边时,立即会想到当年的那一丛纸荷花。

记城南南街的茶馆多,靠大十字处就有两家,有一家名叫“集贤村”,其实里边的茶客都是手艺人 and 下力的人,石木二匠居多。茶馆门口有一补碗的摊子,一个磨刀剪的长凳。那磨刀人无论有活无活,整日都是坐在凳子上。街中部那个茶馆较大,可容百余人,因此很长一段时期有说书人在此说评书。说书人姓饶,几乎全城人都知道他,原因是从老到少的许多人都听他说过书。那时文化生活极其枯燥,能够阅读自娱的人很少,“封神”“西游”“三国”“水浒”包括“精忠岳传”的种种精彩故事就靠说书先生宣讲传播。

老南街的茶馆到文革时被取缔,说书人也在时歇了业。著名说书人饶先生早些年已经作古,但安顺人至今没有忘记他,据我所知,直接写他的文章,或者以他为原型写的文章迄今最少有三篇,其中有一篇就是作者的拙作。

如今,安顺城中有了一些茶室,但消费较高。而现在四川成都类似原先安顺这种大众消费的茶馆比比皆是,据说以千数计,成为锦城一景。

写到饶先生时,让我想起南街靠大十字东边的另一位老人,那就是戴明贤先生作品中的“海马公爵”。在戴先生的笔下,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,其经历及作为有着童话般的梦幻色彩。城中老掌故、画家邓文郁先生看了戴先生的文章后,又写了一篇充满现实主义的文章。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“海马公爵”,老人原是一位重情重义的民间收藏家,一个“穷得硬气,饿要新鲜”,不肯低眉折腰的汉子。

我之所以想起了这位老南街早已作古的老人,除了是看过戴、邓二位的文章印象深刻的缘故外,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见过这位老人,瘦瘦的身材,留一头披发,对人极其和气。尤其对站在老大十字等候来人雇佣的“扁担龙”们特别关心。老人实姓郭,他的一位孙女与我是小学二年级同班同学。

关于老南街的回忆,一时间难以讲述清楚。如果有意,写一本安顺版的“城南旧事”,三二十万字也只能叙个浮光掠影。

回想起来,城市给人的记忆,最深刻的莫过于道路交通、饮用水和照明三件大事的变化。

老南街上,原先是石板,不能通汽车。每天都有驮马过路,偶有大队马帮,全街轰动,马帮过后,一地马粪。上世纪50年代改为三合土马路,也是偶有汽车路过。而汽车过时人们都要出来观看,记忆中我是跑出去嗅尾气,觉得这尾气有一种香味。今天说起这事,有几位同龄人当年的感觉居然和我一样。这岂非怪事?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,三合土变成了沥青路,此时,马车汽车、大车小汽车,都能自由出入这条街上。也正是这些今天被看成有损于城市的负面行为构成了当时的繁荣。

回忆当年的照明,原先大多数人家用油灯,极少数人家能用上引擎发电厂供的电,早上八点开始,十二点停电。50年代中后期有了火力发电厂后,老南街上才有了昼夜不停的电源。

如今南街的巨变,是经过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之后,改革开放的机遇造就的成果。也有人说,“风水轮流转,马鞭草转转花”,因此昔日的“苦养肥”才变成了今天安顺城最繁华的闹市。这是一种调侃,也是老南街人表达的一种由衷的喜悦。

夜幕降临,光影婆娑,收起忙碌一天的零乱,湖上一盏朵贝茶,拂过一阵沁人肺腑的清香,梳理疲惫的心情,放飞自由的思绪。此刻的茶香,便成为提笔叙述、文思泉涌的“催化剂”,成为与古今中外文人雅士们精神相遇的“引路人”。

每每湖饮朵贝茶,纵是身在数十里之外的安顺小城,我都能在陋室之中隐隐地嗅到那一丝丝清幽的茶香,从一个叫做“化处”的地方轻轻飘来。

“化处”古称“天竺”,以盛产朵贝贡茶而闻名,在贵州、在安顺、在普定,这几乎是众人皆知、谁也不争的事实。“贡茶之祖”受人膜拜,千年不衰,传承着一个关于茶的品质追求、做人如茶的美丽传说。

昔日,那个叫做“天问”的和尚游至此,为何独留此间数十年,自然有吸引住天问和尚的诸多缘由。据《郎岱县志》载:“一僧名天问,河南陈州人,崇禎年间官于湘。明鼎革,弃家妻子遁于黔中,不道姓名。桂邸败状闻,遂削发为僧……至天竺永兴寺削发为僧,法号天问”。今天的化处曾叫“天竺”,而双凤山寺在清朝初年也曾叫做“永兴寺”,这位不知名姓的出家人“天问”就曾在修禅并坐化离去,飘散在岁月的记忆深处。

如今,天问和尚早已坐化而去,难道他真的对此无动于衷了吗?传说他坐化之时忘记了一双鞋子,到了昆明后遇到一个化处人,便交待日后将鞋子焚化送去给他。这人与神之间的交流,竟是如此的充满了人情味。天问和尚昔日



每年清明时节,我都要到西秀区轿子山镇大山村祭祖上坟,那里是母亲的故乡。大山村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村子,每次我去都是在春花灿烂的时候,桃花、梨花、李花,姹紫嫣红,十分好看。

村里有数十户人家,多姓俞。俞家是600年前从浙江上虞县迁居而来,是大明王朝的剿集军,屯守西南,战时征战,闲时种田,虽然如此,祖祖辈辈仍保留亦耕亦读的习惯,对培养子女的重视,还有,他们天生的理财能力等等都使我惊讶。他们的眼界之广阔和超前,他们仿佛天生下来就立志从乡村到城市去追逐梦想,在今天是很多人所不及的。

这个乡村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疑问,也留给我太多的思考。王若飞祖籍是大山的,安顺最会做生意的帅家祖籍也是大山的。作为一介农夫,他们骨子里对知识文化的尊重,对培养子女的重视,还有,他们天生的理财能力等等都使我惊讶。他们的眼界之广阔和超前,他们仿佛天生下来就立志从乡村到城市去追逐梦想,在今天是很多人所不及的。

外公姓俞,名廷发,号相卿,是村里众多读书人之一。俞廷发和陈曾固是同学,两家有姻亲。陈曾固是邻村陈家村人,他们小学就读于峰山小学,后来陈曾固进城读书,考入北京朝阳大学。

我那年近80岁的舅父上世纪50年代初就读重庆大学,作为中国地质专家,1962年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到越南开发矿业。他电话告诉我,俞家与陈家、帅家都是亲戚,外公和陈曾固私交很好,后来陈曾固就读安中,租住在北街一个院子。外公家里贫寒,进城做生意时,还相互常来往。外公古诗做得好,字好,他们经常吟诗唱和。

1998年,我采访原安顺图书馆副馆长帅国益时,才得知他是陈曾固的外甥,我们谈到大山乡,谈到陈曾固。他得知我外公的名字后,就告诉我,1981年他陪舅父陈曾固回大山,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我外公,当时在跳蹬场坝上还买了一块肉,得知俞廷发已经搬进城以及已经去世20余年后,悲伤不已。

外公同学中还有一个同村的同学叫俞天寿,读书、放学常常在一起,割草喂牛常常在一起,读书讨论心得常常在一起。后来三人走了不同的道路,陈曾固后来进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,加入共产党,到过延安,解放初任贵州省委第一副书记。俞天寿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四期,在南京保卫战中任卫戍司令部高参,南京失守前任临时代理司令,在日本进入南京时,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,在南京马关牺牲,可歌可泣。外公作为独子,肩负养家糊口的

从乡村到城市

□成义

重担,只得在家亦耕亦商亦读。

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学,同学影响所及,陈曾固劝外公和他一起革命。临出发时,祖母跪求不走,因外公是家里的独子,终于未能成行。否则,外公命运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

外公年轻到煤矿挖过煤,耕种,日子苦得很,但是很有眼界。娶了外婆后,外婆却有经济头脑,以家庭纺织棉布为业,自己出售,兼营竹器、小百货,慢慢积累了家产。

因为农村土匪到处作乱,外婆便撮合外公搬进城,从小农民转为小商人,赚了钱买地,这是安顺一般商人积累财富的做法,到后来家乡买田、买地,在城里修起大瓦房,成为令人羡慕的家庭。

外婆和母亲分别一个织机,织一个月,能卖两个大洋,一年赚的钱相当于一个产业工人3个月的工资。从天一亮就开始,要到晚上点油灯,中午、晚上是抓炒好的一把干包谷就茶水咽下,算是中饭和晚饭,日子之苦,一般农村人是不知道的。

到了星期天,一家人去赶集,跳蹬场是安顺农村较大的乡场,离安顺有10余公里,往往4点钟起来走路,要8点钟才到,光在路上时间就是4个小时,还要挑着担,路上挑不动,没有人换肩,从山到回家,一天的时间,很是辛苦。

外公经商大约很成功,他没法去求功名,只得一心修身齐家,培养子女读书,把两个儿子送到城里。为此,立志赚钱下决心搬进城。

外公一生命运多舛,经商路上少不了路上土匪的经常袭击,一次被土匪绑架,在干峰山关了半月,被勒索大半家财,才放回家。

后来又当被当地劣绅陷害,被关进牢里,花了一大笔钱保送出来后,经过几次磨难,上世纪40年代中期,全家搬到城里。

家搬到大桥头照春路,这是外公花了一辈子的积蓄建的房子,在安顺西街大桥头的一条巷道内,两层高,数百平米。我从小住在这里的老屋,据我父亲说,当时大桥头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,有贯城河的沿流经过的一座桥,旁边是照春公园,民国六年所建,竣工后,任可澄还题写了“寒巢夏屋,熙熙春台”八个大字,当时是街实西北隅的中心。不远处就是二桥,沿岸种有柳树,沿河看柳,春意盎然,后来捣毁时树被挖掉。我看过30年代的大桥头老照片,很是漂亮,已然非后来的样子。

外公是知识分子,总想依靠法律保护全家,自己买了一套《六法全书》研究,以避免被人欺负,或许有一天上了法庭为自己辩护。他自己研究《易经》,闲时给人看地和算八字,更多的时候是吟诗作对,到了春节就给家家户户写对联,不收钱,做善事。

每当开学,外公拿出两摞高高的大洋给两个儿子交学费,两个儿子不负厚望,上世纪50年代初,两个儿子中一个上了重庆大学,一个上了大连海运学院,后来一个在北京,一个在昆明,家给富足了。其后,在老屋落成不到五年,外公便离世了……一生的心血竟没能享受成果,这时,外公才六十出头。

往事中



安顺老城

□油画 孙长喜 作

天竺小镇

□王继平

住持修行的双凤山寺,如今只留下了一些残存的遗迹,唯有这一株株他亲手植下或是采摘过的朵贝老茶树,却是根深叶茂,情深意长。

朵贝老茶树,从一个文化的深层面,不经意的记住了一个叫做“天问”的和尚。昔日“天问”,今日“问天”?化处曾经叫做“天竺镇”,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名字,不仅富有诗情画意,而且更充满了佛禅韵味。天问和尚吃斋念佛之余,他对朵贝茶的制作品饮更是用心良苦,精思细作,以一个外来大师出神入化的手法技艺,熟练地将其精深的茶道传播到了这个叫做“天竺”的小镇,因为茶的原因,带动了化处地方上村民们种茶的热情,提升了他们喝茶的品味,并且还延长了老人们寿命。据统计,现化处境内的长寿老人极多,尤其是张家村,光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80多位,其中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位,难怪这里被誉为“长寿村”,当之无愧。

作为“普定八景八洞”之一的“玲珑山”,如今被称为“空山”,她处于化处境内,与朵贝贡茶、天问和尚不无关联。或许是在一个朗日高照的晴天,或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中,或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或是与一些村民老少闲谈,在

这个空山之中,云游至此的天问和尚,或许会因为这里的空山美景,茶树丛生而弥漫下来,静坐净心,参禅悟道,吟诵古今。

如今,没有了天问和尚的“天竺”小镇,人们并没有太多的伤悲,对于这个记忆中飘逝而去的智者,他的灵魂精神永远留在了这里。在化处人的心中,他仍旧闲游在那一株株千年老茶树下,一边采摘,一边吟诵,一边讲经念佛。他身披袈裟,心怀众生,制茶制药,不曾离去。

这里,我要借用诗人重庆子衣的诗,结束我的关于朵贝茶的思绪。“空山、新雨。隐身于一棵古茶树/无需云雾,轻盈的足音来诠释/我已在空蒙烟雨里/领悟到朵贝一份安静空灵的禅意/茶香”。



文史

知青杂忆(九)

□文龙生

也许是老天开眼了,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,1977年春我幸运当上了民办教师。同以前羡慕的那两位女知青一样,全年“满勤工分”,每月还有10元“灯油费”。

其实,我是沾了大潮流使然的光!党中央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,文革结束,举国上下许多事情逐渐“明转晴”。格日,那遥远的小山村,当然也不例外。那年春节后一天,大队杨支书支到安顺,走访我担任格么小学民办教师,经大队党支部研究,决定我担任格么小学民办教师,开学前去学校报到。“不要辜负组织和群众的期望啊,我们是经过再三考虑才定下来的”,杨支书语重心长。难以置信的喜悦,令我惊喜不已,几晚上都睡不着觉,用现今流行的话:幸福来得太突然。我真的要感谢大队杨支书,感谢那些关心我信任我的乡亲们,是他们在我处于彷徨迷惘、“破帽遮颜过闹市”的时候,让我看到一点点光明和希望。

当然,到了学校才知道,以前担任民办教师的那两个女知青,找到工作远走高飞了,学校差老师我们补缺。不过,这点“插曲”也不影响我对那些好心人的感恩。

说起当老师,很是惭愧,以前从未接触过有关教育的东西,连备课写教案都不会,只是比照其他教师,照样画葫芦备课上课做作业。好在地区一中的那点底子派上用场,自己平时也爱看一些文史类书籍,文化上还算强人意。认真看书备课上课,教学得到学校师生认可,还代表学校在猫营区作交流发言。那时候“读书无用论”尚有余毒,教学普遍不甚认真,“学生混光阴,老师混工资”,农村学校尤其如此。是啊,当年许多农村学校老师,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,教政治的不了解时事,教语文的错别字连篇,教历史的上下五千年稀里糊涂,我们这些知青同那些误人子弟的“南郭先生”相比,其它不好讲,文化优势还是明显的。

格么小学8个老师,除校长与另一人外,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(至今我都不明白,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有啥区分),格么小学是设有戴帽初中的完小,各有一个班级。8个老师教7个年级7个班,课程设置多是“化繁为简”,小学仅有语文、数学、体育,初中勉强增添政治、物理、历史等。全校老师最高学历是文革时期中师生,这种教学效果怎样?真的只有天知道。好在学生不多,每班十几人,批改作业不算繁重。

这个学校是全村最好的砖木结构瓦房,孤孤单单、简简单单两层楼,和一个非常简陋的篮球场。窗户玻璃没有几扇完整,楼梯顺着教室直上直下,无甚阻拦,教室不隔音,楼上楼下上课,互相望得到听得见。不可思议的是,教师少教室有限,搞“二部制教学”,即两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个教室,上这个年级的课,另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,反之也如此。

虽然环境恶劣,教学条件要啥缺啥,但格么小学校长颇有能力,学校还张罗得不错,比不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。特别是我们三个知青强力加盟(事实也如此,恢复高考第一年,三个皆榜上有名),学校办得红红火火,生源大增,其它大队和公社,乃至镇宁县境,都有学生慕名而来。但好景不长,恢复高考消息一公布,几个知青老师丢下一张假条,迅即“大逃亡”。今天仔细想起来,我们真的不称职不够意思。多年以后,一些学生还在这样议论:如果不是几个知青老师高考走人,他们要多学些知识,命运可能有所改变。

我在格么小学只当了8个月的老师,教初一、初二的语文。日子虽短,也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、值得回味的精彩片段。那时格么小学建有文艺表演队、篮球队,搞得有声有色,热火朝天。篮球队由知青老师徐兴发担任教练,他训练篮球的方式新颖标准实用,那球场上插竿训练“带球过人”的动作,让山里人大开眼界,赞不绝口。球队还打到猫营中学、江龙中学。我将一些革命歌曲,改编为应时应景的表演节目,让学生歌之舞之,也算一道风景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,一天晚上,区、公社领导闻名前来观摩调研,篮板架拉起长长的绳子,吊起几盏大煤油灯,周围站满了人,师生上台表演“自选”文艺节目,没有音响伴奏,但歌声、朗诵声、二胡声,幽婉、悠扬,随风飘荡在大山夜空。那独特情景,至今回味起来,尚有几分清醇。

那年头,农村因贫辍学的孩子很多,劝说学生返校读书,是上面的硬任务,也是学校和老师头痛之事。那些小山村都是山一家水一家,分散得很,挨家走访,并非易事。有天,我分片包干走完最后一户,天已黑尽。走进格日尚有十几里远,一个人行走在漆黑山路,四周杳无人烟,除了大山还是大山,凄清寂静得怕人,偶有声音那是风吹草动,不经意间见到一些坟墓,更让人心惊胆战、毛骨悚然。那时那刻,我多想身边有个伴啊!别说是人,哪怕一条狗一只鸡,都能壮胆、给予安全感。有生以来,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异常孤独的可怕。

更要命的是,离格日寨子二三里远,有一个大大水塘,据说还淹死过人。走近那里,我硬是绷紧神经憋起气,眼睛定向前方,根本不敢看水塘,想跑又不敢跑,魂飞魄散跌跌咋咋了?魂不守舍走了好半天,临近寨子,闻听犬吠声,才松了一口气,三步并两步,连走带跑,回到屋里,浑身冒虚汗。

农村学生不安心读书的人多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是家常便饭。初有一个学生多天未见踪影,出现在课堂时,问其原因,答曰:不好意思讲,追问之,埋头尴尬地说,结婚去了。他实话实说,教室里哄然大笑。

那里的学生真挚,不少是一大早走十多里山路来上学,临行前吃点包谷饭,一直管到下午放学。尤其冬天,寒风刺骨,大雪纷飞,冻得孩子们小脸小手通红,好些鞋不裹足露出脚趾头,让人十分痛心。

但,农村学生淳朴厚重,重情重义。前些年,一些学生从报纸上了解我的行踪,到安顺来“寻亲”,仍以师长称之敬之。我与他们亦师亦友,常来往往,亲热得很。

可我,一想起当年不辞而别,丢下他们赶考之事,心里沉甸甸,别有一番愧疚。